

日本对新加坡的移民和经济渗透(1868—1941年)

卢水雄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62)

摘要:1868—1941年,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以南进思想为指导。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将南进思想付诸实践,主要以移民和经济的方式对新加坡进行渗透,移民渗透和经济渗透相辅相成。1941年以前,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目的是扩张自己的势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准备,其结果促使日本经济得到了发展、军国主义得到强化,为日军攻陷新加坡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日本;新加坡;移民;经济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7-0063-04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3.17.011

Japan's 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Infiltration into Singapore (1868-1941)

Lu Shuix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Abstract: From 1868 to 1941, Japan's infiltration to Singapore was guided by the thought of southward movemen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strength, Japan began to put the thought of southward movement into practice, mainly infiltrating Singapore through immigrant and economic means, in which immigration infiltration and economic infiltration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Before 1941, Japan's infiltration into Singapore was aimed at expanding its power and prepar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s a result, Japan's economy had developed and militarism had been strengthened,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Japanese army to capture Singapore.

Keywords: Japan; Singapore; immigration; economy

明治维新后,在南进思想的引导下,日本开始了对新加坡的渗透。臧运祜研究了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林庆元、杨齐福研究了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源流。吴占军分析了明治时期日本对外移民的类型及转变原因,朱忆天比较系统完整地研究了“南洋姐”的源流,清水洋深入探究“南洋姐”在日本向新加坡经济扩张中的作用,原不二夫论述了二战前日本对马来亚移民的类型,但是忽视了“南洋姐”和渔业移民。目前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历史,以及宏观把握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在南进政策引导下与东南亚的关系,而具体到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与新加坡乃至海峡殖民地关系研究却很稀缺。本文主要依据日文史料、“二战”前新加坡报纸以及海峡殖民地政府报告,探究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背景、方式以及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关系。

一、移民渗透和经济渗透的背景

江户幕府末期,日本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解决危机,日本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南进思想就是其中的一种。本多利明曾提出“海外雄飞论”,认为日本土地有限难以容纳更多人口,应该积极推行海外贸易与殖民,向海外进行扩张。菅沼贞风在《新日本图南之梦》中提到“复马六甲而握新加坡之峡门”^[1],新加坡以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日本对其虎视眈眈。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对于海外移民采取消极态度。随着日本不可避免地加入“大移民浪潮”中,日本在1885年开始了“官约移民”。但是夏威夷王国在1894年灭亡,导致“官约移民”失去了其存在基础。日本政府在1907年对《移民保护法》进行修改,使对外移民的责任主体从政府变成了移民公司,日本对外移民进入“私约移民”时期,移民政策的嬗变是日本向新

加坡移民的基础。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随着“地租改正”和“松方紧缩财政”的实施,大量底层人民无以为生。当时的移民公司出于赚取利润的目的,将部分农民送往国外,而政府考虑到失业人口增加,对这种现象持赞成态度。恰好当时的新加坡对日本人移民没有任何限制,并且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移民所需花销少,是移民的好去处^[2]。从民族特性来分析,马来人不如日本人吃苦耐劳,在工商业方面更是不及,并且对日本人抱有好感^[3]。

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日本就曾和东南亚地区进行过“朱印船贸易”,当时至少有一万人移居南洋地区,这一历史互动为后来日本人移民新加坡奠定了基础。1879年,日本第一次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1891年,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数量为287人,其数量在不断增加,直至1937年为3973人^[4]。

新加坡日本移民的增加,带动了日本对新加坡的贸易,促进了其经济渗透。例如日本妓女到达新加坡后,需要大量的日本服饰、食品等。日本所保存的昭和财政史资料中就曾提出经济南进的观点^[5]。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产品需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并且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处。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转口港和经济中心,自然也就成为日本经济渗透的目标。

二、日本移民渗透方式的多样化

日本对新加坡的移民渗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势力和减少国内人口数量。当时的日本对新加坡移民主要可分为商业移民和农业移民。从移民的阶段来看,日俄战争前主要是日本妓女移民,战争后大量其他行业者才开始移民新加坡^[6]。日本对新加坡以移民渗透为先导,从而起到促进经济渗透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日本对新加坡最初的移民形式是商业移民,日本妓女移民作为商业移民之始,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占据主流。从地域来看,前往新加坡的日本妓女多来自九州地区,这与九州港口众多是直接相关的。移民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生存和高收入,其次是日本妇女被贩卖和强迫卖淫,并且当时的新加坡有着大量男性劳动力。日本妓院多位于新加坡的“海南街”“马来街”“马拉巴街”周围,这些街道是当时新加坡有名的“红灯区”^[7]。1888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废除了《传染

病条例》,日本妓女的数量从此大量增加。

正如清水洋教授指出的那样,日本妓女对于日本向新加坡的经济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起初为日本妓女服务的有日本企业、医院等,随着资本的增加开始面向其他人。其后,轮船公司、银行等大型日本企业也开始进驻新加坡。在新加坡,日本妓女占主体的“共济会”贷款给日本小商人,成为它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并在日本社区的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日本妓女成为日本南进的最初实践者,同时为近代日本工业的发展争取了大量外汇。

在日本妓女移民开始之后,劳动力移民开始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期,英属马来亚地区的橡胶园迅速扩展,因此前往马来亚地区的日本人增多。但是许多日本劳工因为水土不服,患上了热带病^[8],因此被遣送回国或者前往其他地方工作。“一战”爆发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这导致前往新加坡的劳工大量减少。日本政府通过出口劳工获得了外汇并且扩张了海外势力,海外日本企业获得了低廉劳动力,唯有日本劳工成为日本向新加坡渗透的牺牲品。

劳动力移民没落后,资本移民开始崛起。日本在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其后爆发经济大萧条,以前的移民方式收效甚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携带资本的企业移民,并且补助路费。携带资本的企业移民后,将会刺激国内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于日本商品的生产、销售、海外原料的进口都有好处。日本政府鼓励企业移民是和当时国内资本过剩相符合的。

农业移民包含筹办橡胶园的种植业移民和前往新加坡从事渔业的移民。十九世纪晚期就已经有日本人前往新加坡水域捕鱼,新加坡的日本渔民人口占当时新加坡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9]⁹⁴。新加坡日本渔民中的大多数来自冲绳,日本政府为了获得新加坡渔业情况,甚至派遣专家前往调查,此后新加坡的日本渔民迅速增长。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随之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渔业资源破坏,使得日本渔民需要前往更远水域捕鱼,其月收入随之下降^[9]¹⁰⁴。对于日本渔船队在新加坡附近水域的扩张,英国殖民政府怀疑他们充当日本海军的情报机构。因此从1937年开始,英国殖民政府开始采取限制日本渔民捕鱼活动的措施^[9]¹⁰⁹。在上述一系列因素冲击下,大量日本渔民不得不离开新加坡。

1902年,笠田直吉、中川菊三来到马来亚地区开办橡胶园^[10]。1915年,橡胶价格开始不断上涨,因此大量日本人来到新加坡购买土地筹办橡胶园。1920年橡胶价格暴跌,于是出现了橡胶园合并重组的情况。由于东南亚很多植物是多年生作物,加上土地购买费用,导致开办橡胶园需要较多的资金,因此农业移民的人数不多。农业移民尤其是种植业移民是以占领土地为前提的,在渗透的同时实行另类殖民。

虽然矢野畅在其《日本人的南洋史观》中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向东南亚的移民属于“无告之民”即自发性移民,但是更应该看到,这种移民在当时南进论兴起的背景下,客观上起到了渗透的作用,并且促进了经济渗透,二者相辅相成。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向东南亚的移民并不完全是民间自发性的,政府采取了许多鼓励措施,将移民当作南进的工具。

三、日本对新加坡的经济渗透通过贸易来实现

1941年以前,日本对新加坡的经济渗透反向推动了移民渗透,经济渗透以贸易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对新加坡的贸易最开始是为了迎合新加坡日本妓女的需求,随着关系的密切,双方之间的贸易增加。由于十九世纪后期世界银价下跌,使得日本对新加坡的出口相比于西方国家占据有利竞争地位,因此,从1894年开始日本煤在新加坡煤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11]。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全力与中国作战,并且其后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消化战争果实,从而暂时放松了对于新加坡的经济渗透。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乘战胜之余威,大量日本商人和企业开始进军新加坡,日本商品一时行销新加坡。截至1910年12月底,新加坡有178名日本商人^{[9]67}。

“一战”前,日本商人在新加坡势力单薄,日本利用华侨商人与新加坡进行贸易,从而达到经济渗透的目的。日本与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除了像三井公司等部分日本企业参与外,其余基本都掌握在华侨商人和欧洲商人手中,日本商人则主要充当日本制造商和新加坡进口商的中间人。堤林数卫在《太阳》杂志曾发文说“然兹最堪注意者,则现在南洋之贸易,若将华人除外,则无论任何事件,皆将限于无能为力之状态”^[12],这印证了华侨商人在日本对新加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战”爆发后,日本大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加快对新加坡实行经济扩张的步伐,棉纺织品、橡胶木箱、火柴等日本商品的出口额大幅增加。为了扩大日本在新加坡的贸易,南洋协会利用日本政府补贴于1918年4月在新加坡设立了商品陈列所^[13],主要是为了调查市场、展示日本商品。由于新加坡的西方银行不会轻易给日本企业提供贷款,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华南银行这三家日本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为在新加坡的日本企业提供贷款。

“一战”结束后,大量日本中小型贸易公司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对新加坡经济渗透的态势。日新贸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复苏,但在1928年,中国发生的“济南惨案”引发了新加坡的大规模排日运动,日新贸易再次受到影响。其后1929年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衰退、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导致新加坡爆发排日运动,都对日新贸易造成了影响。

1931年12月,日本退出金本位制,随后日元汇率下降导致日本产品在新加坡变得低廉,新加坡人开始更乐于购买廉价的日本产品^{[9]76},日新贸易开始又变得活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日本对新加坡的经济渗透并没有引起新加坡殖民当局的反制。这是因为新加坡一直以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为了保障亚洲殖民地的安全,不敢得罪日本。随着日本对新加坡的经济渗透严重影响英国对新加坡的贸易出口,新加坡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在1932年6月的立法会议上,海峡殖民地总督要求改变自由贸易政策。1933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在大部分殖民地与属地实行进口棉纺织品和人造丝制品分配制度,并且命令海峡殖民地政府实行相应的法律措施,这主要是为了抵制日本棉布的出口,保护英国对新加坡的棉布贸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新加坡发生了强烈的抵制日货行动。与此同时,海峡殖民地政府将棉花和人造丝制服装纳入分配制度。这沉重打击了日本向新加坡的贸易,此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没有得到恢复。

日本对新加坡的贸易只是表象,其实质是经济渗透,想要将新加坡置为其商品倾销市场。日本对新加坡的经济渗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期间有过暂时的放松,其中华侨排日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但是日本的南进战略并没有改变,因此日本对新加坡的经

济渗透在经历短暂放松后又会以更强硬的力度卷土重来。

四、结语

1941年以前,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是日本南进的结果,同时也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移民渗透导致新加坡日本间谍的滋生,《伦敦每日邮报》在1934年曾刊载“新加坡方面,有许多间谍,企图查发新加坡军港之秘密”,还指出日本方面准备在暹罗开凿克拉运河以建筑自己的军港。1935年,英国海陆空军在新加坡举行大演习,新加坡的日本商人西村利用经商之机窃取军事情报。

军事情报泄密使日本了解到无法用航空母舰进攻新加坡,从而开始采取陆地进攻战略,为最终攻陷新加坡提供便利,这有助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1941年以前,日本通过新加坡这个重要的转口港,将经济渗透延伸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从间谍滋生和经济渗透两个角度来看,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来看,新加坡在“一战”前是英日同盟的根据地,但是“一战”后英国面对日本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势力逐渐扩张的情况,开始对日本采取提防乃至敌视的态度^[14],加强新加坡的防卫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更加快了日本南进的步伐,因此1941年以前日本对新加坡的渗透在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吉田三郎. 兴亚论[M]. 东京:旺文社,1944:36.
[2] 堤林数卫. 日本人之新南洋发展策:一[N]. 南洋商报,1924-03-06(10).

- [3] 堤林数卫. 日本人之新南洋发展策:十一[N]. 南洋商报,1924-03-20(10).
[4] MAKEPEACE W.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M]. Singapore:Singapore prep press,1919:358-360.
[5] 日本大藏省. 昭和财政史资料:南洋群島の統治及経済的発展に対する所見[M]. 东京:大藏省财务总和政策研究所财政史室,1930:1.
[6] 堤林数卫. 日本人之新南洋发展策:二[N]. 南洋商报,1924-03-08(10).
[7] BILL MIHALOPOULOS. Statehood, Gender, and Japa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0-1920[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145-160.
[8] 原不二夫. 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M]. 刘晓民,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32.
[9] HIROSHI S,HITOSHI H. Japan and Singapore in the World Economy: Japan's Economic Advance into Singapore 1870-1965[M]. London:Routledge,1999.
[10] 入江寅次. 邦人海外发展史:下卷[M]. 东京:井田书店,1942:144.
[11] SETTLEMENTS S.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the year 1896[M]. Singapore:Straits Settlements Print Office,1897:321.
[12] 堤林数卫. 日本人之新南洋发展策:六[N]. 南洋商报,1924-03-11(10).
[13] 井上雅二. 日本南洋协会之使命[N]. 南洋商报,1931-05-18(3).
[14] 佚名. 马来亚各地大日本领事馆关闭感言[N]. 昭南日报,1942-03-25(1).

作者简介:卢水雄(1997—),男,汉族,湖南衡阳人,单位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